

启明文丛

历史活着 (增订本)

李天纲 著



历史故事

历史故事



历史故事

历史故事

启明文丛



历史活着

(增订本)

李天纲
著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活着 / 李天纲著. —增订本.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2

(启明文丛)

ISBN 978-7-108-05230-8

I. ①历… II. ①李… III. ①中国历史—文集 IV. 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7872号

责任编辑 刘 靖

文字编辑 郭晓慧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2月北京第1版

201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18.25

字 数 203千字

印 数 0,001—8,000册

定 价 35.00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目 录

告别帝国 1

告别帝国 2

我们的“公元” 7

人格与国格 11

城邦：希腊文化的关键词 13

两种“罗马的遗产” 17

基督教：了解西方文化的钥匙 21

我们需要知道一点纽曼 27

《历史哲学》仍然可读 33

哲人的误视：罗素的“中国之问题” 38

走出中国的“中世纪” 41

E时代的考据之魅 46

景风东扇 57

景风东扇第一叶 58

利玛窦进京四百周年感言 61

曝一点清史的真料 65

读《心史丛刊》兼议清史难读 68

“圣学”与外语 75

翻不了的和珅案：兼谈新清官戏得失 79

乾隆皇帝与和珅“同志” 86
外眼看中国：阿罗姆画中的明清社会 90
版画里的历史 102
那时代还不是上海 106

墓前遐思 109

徐光启墓前遐思 110
顾炎武：性情中人 119
“百年之子”马相伯 123
李鸿章的“痞子腔”（外七篇） 134
不学有术袁世凯 147
翻译的自尊：读《清史稿·李鸿章附传》述感 149
“超越东西方”的吴经熊 156
重建“公共性”：“文人论政”的近代轨迹 159
“与官不做，遇事生风”：黄炎培“在民间” 166
“我们的赫德” 177
“中西医的调人”德贞 181
一抹残阳：李叔同的“三个境界” 188
“恩人饶家驹” 191

诗无达诂 195

诗无达诂 196
经筵讲“四书” 200
京畿消夏造大园 202
谁先抢了圆明园 205
“乡下人的老例”：新读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 210
熊十力先生《乾坤衍》读后 214

历史活着 217

历史活着 218

从“军绅”到“党国” 224

当“崇拜”成为“记忆” 230

“党国一体”的先行者 242

历史与意识形态之间 256

“戊戌变法”与士大夫命运（外一篇） 261

费慰梅眼中的梁思成 266

海外学人的心境 270

最难忘情是中国 274

史家的不幸与幸 277

志在“科学的中国近代史” 282

后记 284

新版后记 286

告别帝国

告别帝国

我们的“本世纪”，是告别帝国的一百年。1900年，世纪伊始，义和团事件在北方爆发，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亡命出逃，“西狩”长安。尽管清朝是在十一年后崩溃的，但1900年中国人考虑的问题再也不是“清朝向何处去”而是“中国向何处去”，人们相信：告别帝制，建立宪政只是时间问题。

1900年7月26日下午，青年学者章太炎到上海沪西的张园开会，参与组织“中国议会”。会上他怒而反满，举刀“咔嚓”，当时当地，是中国第一根落地的辫子。随后的十年里，从上海到内地，从南方到北方，清国人的辫子纷纷落地。大清王朝，无可奈何花落去。1900年的张园故事，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章太炎剪辫子时非常冲动，甩掉了满人的马褂，赤膊短裤，一时没有合适的衣服换。仓促之间，他穿上朋友的一套西装。“会执友以欧罗巴衣笠至，乃急断发易服。”“改国号”“易服饰”本来是改朝换代的大事，马虎不得。“革命文豪”“民国元勋”的章太炎却是临时穿起借来的西装与满清帝国告别的。这正好象征着：20世纪的中国，变了。变得世界化，国际化，变得不再是帝国，同时也变得仓促慌乱。辛亥革命后，国号换成了章太炎拟定的“中华民国”。

但是，帝国的幽灵并没有马上散去。一百年的 Republic，要

向两千年的 Empire 告别，时间还不够。中华帝国在这一百年里骤然改制，从上到下，方方面面，确实很难适应。这是中国这一百年中进退失据，举止无措的主要原因。一百年里，我们像《活着》一样“活着”。我们曾恢复过帝制，曾领受“军政”“训政”，过过“新生活”，试过“大跃进”，闹过“文化大革命”，文化、政治、经济、习俗，不断改革，持续革命……忽而全民“咸与维新”，又忽而同声“万寿无疆”。两千年来，“吾日三省吾身”，曾经“慎独”，善于发现自我的中国人，变得严重依赖外部的新思想、新玩意儿来填充空虚。在 20 世纪的全球思想贸易中，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入超国。旧帝国的废园，成为各种新鲜“主义”的试验田。事后总结运动，每次都要控诉“始作俑者”的过错。可细究起来，无一次无有广大人群的积极参与。原因无他，发动者与参与者都是帝国的旧臣民，同好同恶，同急同迫而已。站在二千年的门槛审视我们的世纪，常常会发现：中国人的百年焦虑，百年浮躁，就是因为失落了帝国。

历史学家一直把世界上的两大帝国相提并论。公元前后，西方有罗马帝国，东方有秦汉帝国。范曄的《后汉书》，把这两大帝国称为“大秦”和“秦”：罗马帝国“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伏尔泰和莱布尼茨也都说过，世界史上，真正称得上帝国的只有两个：他们的“罗马”，还有东方的“中国”。埃及、印度和波斯，固然也有帝国时代，但是近两千年里，他们都改换过文明，不能薪传自己的精神。世界上的“老大帝国”，只有罗马和中国有传人。两千年里，帝国一直是欧洲政治家的理想，而《马可波罗游记》传递给欧洲人的中国信息是理想中的理想。什么是帝国？13 世纪，意大利人但丁写《论世界帝国》(De

Monarchia), 理想化地这样描述: 世界帝国是应天命, 由一个高贵民族统治其余民族, 并能够充分发展人的智力, 保证世界和平的大一统社会。但丁是文艺复兴时写《神曲》的诗人, 过了这六百年, 要是真有跨越时间的对话, 现在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对他说: 这样的理想社会, 无论在罗马, 在中国都没有存在过。两千年来, 帝国的政治是专制, 帝国的文化是一元, 帝国的经济是掠夺。帝国给人们带来的总是血与火。这一点, 人类是在 20 世纪后半期才真正开始认清的。

中华帝国大约是比较罗马帝国幸运。秦汉一统, 完成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意识形态建立起来, 幅员超过地中海沿岸的罗马帝国。随后, 半胡人的李唐王朝从西部入主中原。唐代引进了印度和西域文明, 但汉族文化并未因此衰落, 反而还出现了“三教并立”的多元文化局面。看唐太宗李世民在朱雀大道前城楼上的那种得意: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 那一定也是“条条大道通长安”, 万方来朝, 山呼万岁的盛况。西望罗马, 同一时期的罗马帝国已经在蛮族入侵下崩溃, 城市里种地, 进入衰退的中世纪。罗马的教皇不断联络西班牙、法国、德国的国王, 企图重建“神圣罗马帝国”, 都失败了。再以后是蒙元和满清入主中原。这一时期, 中国的幅员世界最大, 超过整个欧洲。况且, 欧洲近代分裂为民族国家以后, 陷入“战国”, 文化、文字、宗教各立一套, 一千年里打得不可开交。那时的中国人确实可以得意。没有意识到的是: “战国”以后, 就是群雄并起, 霸业完成。

中国人的天朝得意, 维持到很晚。康熙把罗马天主教的耶稣会士招为“内廷供奉”, 画画、修表、量地皮。乾隆一定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 (George Macartney) 跪身磕头。16 世纪以后, 中国人

开始领略到葡萄牙、荷兰、西班牙等欧洲小国商人们的顽强坚硬。但是真正认识到欧洲已经崛起，一直要到 19 世纪临近结束。那时候，以大英帝国为首的法国、俄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个个都是除了本土之外，还有大量海外领地的殖民帝国。虽然欧洲没有重现罗马帝国，但“船坚炮利”的欧洲列强在全球各大洲，瓜分建立了各自的殖民帝国。俾斯麦边叹边骂：你们只给德国留下了天空。日本搭上欧洲列车，加入强权，也要在东亚分一杯羹。老大的中华帝国居然成了饕餮列强餐桌上的最后一道甜点，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时的急迫心情可想而知。

19、20 世纪的中国人，遇到了一个误区。我们成功地告别了帝国，朝自由、民主的世界大势走，但我们的内心却还一直想光复一个比清朝更为荣耀的帝国。列强的侵略，造成了屈辱。但更多的屈辱，是我们自己的帝国心态引发的。百年中，我们要么是“颢颒无知”，要么“以暴易暴”。既失掉了“以德报怨”的儒家风范，也没有学会“据理力争”的万国公法。一百年前我们为义和团吃了大亏。一百年后我们还是没学会 Fair Play。还有足球教练向队员解说义和团对抗八国联军的激情，备战 AC 米兰队。千年以来，我们习惯于教导式地传播文明；这百年中，我们也学会了不断地接受别人的训导。但是我们还是缺乏平行地与人对话、沟通和竞争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 20 世纪多元社会最为必需的。

20 世纪的真正进步是全世界的民众一起拒绝“帝国理想”。政治家们开始严肃地处理两千年来的错误。一次大战后威尔逊在巴黎演讲，号召建立全球对话。二次大战后丘吉尔再次疾呼：霸业的灾难是无穷的，人类再也不应为各自的“帝国”而战了。1945 年在旧金山费尔蒙饭店签署的《联合国宪章》，是两千年来最重要

的和平文献。此后，民族独立，各大殖民帝国瓦解。英国、法国等老的霸权甘愿退回二流国家，德国、日本等新的霸权受到本国和世界人民的严格看管。尽管有过叫人提心吊胆的“冷战”，但是终于没有酿成大战。半个多世纪，各国埋头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已经成就了历史上少有的和平时期。

20 世纪末的世界，已经和二千年的传统社会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信息、资本、市场、教育、人口、信仰、婚姻等各方面的全球化，令“编户齐民”式的传统的帝国形态完全失去意义。比较这一百年的首尾，我们发现：“驱除鞑虏”以后，未必就能够“恢复中华”。改朝换代的意义也不大，徒然地换换主义，换换主人。重建帝国更是已经被证明是妄人们的梦想。或许 21 世纪的中国能够走出新路。如果成功，它必定是借着世纪末的全球化浪潮，以开放的姿态、健全的理智、健康的心态，走到世界民族之林中去对话、竞争、合作。这样才能完成自己的爱国主义，才能成为多元文化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才能坦然地说：我们告别了帝国。

（原载《书城》，2000 年第 1 期）

我们的“公元”

假设我们现在仍用国号纪年，今年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和五十二年”。当然，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没有决定用传统的国号纪年。今年还可以是“民国八十九年”，这个纪年法还在中国东南的一个岛省内沿用着。还设想我们今天真的用上了国学大师章太炎考证和创用的“黄帝纪年法”，2000年则是“汉人开国之四千六百九十八年”，总之，假设中国人一如自己的祖先，全然不睬 Y2K (Year 2000)，哈！我们今天怎么过这个二度的“千禧年”？

时间观念是主观的。人群，人类完全可以现在决定：已经过到今天的日子，从此拉倒重来。二十五史上历朝历代的改朝换代，都是这样做的。“改正朔，易服色”，每个皇帝都有自己的纪年。过完了“康熙六十一年”，还有“乾隆六十年”。一百年以前的中国人，不用十年代、一世纪、一千禧来计算时间。一朝一姓一帝的纪年，“法轮”翻转，这是臣民们的永恒。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变的。

时间概念也是历史的。历史上，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纪年。日本把神武立国作为大和民族的纪元。阿拉伯民族把穆罕默德带领信徒离开麦加（公元 622 年）作为伊斯兰纪元。公年纪年，是由小亚细亚地区的基督徒纪念耶稣诞辰开始的。耶稣活过了，耶

稣又走了。一年，二年……信徒们后来高兴地听说，一千年后，耶稣会回来，他要作千禧年的审判。于是每一颗基督徒的灵魂都为此而时刻准备着。公元1年，正是中国的汉平帝元始元年。

“耶诞”，历史上这个非常特殊的民族习俗，传到了欧洲，传到了美洲、非洲、澳洲，也来到了东亚。当基督教成为一个广泛的世界宗教以后，这样的纪年方法才消除了它的民族性，变为一种全球性的习惯，成了全人类必须认同的铁定标准，号称“公元”。现在的世界各民族都接受了公元纪年。否则，“开除球籍”！去年，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无不忙着在自己的电脑里像捉老白虱一样捕捉 Y2K “千年虫”。全球联网，不分彼此的时代，各人自家的电脑可以有不同的钟点，但人类必须拥有一个能够统得起来的时钟。

地理大发现以后的全球化运动，中国人落后了。中国没有办法抢先把自己的纪年法推到全世界。一百年前，当中国人酝酿在国号之上用统一纪年的时候，本土宗教也做出过反应。针对西化分子要推行“耶诞”，用公元纪年，中国的信徒们也考证“佛诞”“孔诞”，要用释迦牟尼和孔子的生日来纪年。康有为是近代中国不遗余力推行和建立“孔教”的“教主”。1910年清朝将亡之年，他提出“中国宜用孔子纪年”。他把1910年定为“孔子生二四六一年”。章太炎是反满的民族主义者，他提出的是“黄帝纪年”。但是，1911年的中华民国最终采用的不是“孔诞”“黄帝诞”纪年法，而是国号和公元并用的纪年法。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废用国号，改而直接用公元纪年法的政权。

当代中国人计时已经完全西方化了。中国的铜壶滴漏，计时计刻，在四百年里完全改过来了。清朝以前，中国人用“时辰”。

计时。一天十二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夜安寝，卯时鸡鸣，“锄禾日当午”。这是传统计时制下的意境。1643年，明朝的最后一年，崇祯皇帝颁布了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和上海人徐光启编订的《崇祯新历》。这部天人相配的新历，非常精确，但并没有帮助“真命天子”挽回明朝，天下反而被满清夺了去。清朝顺治年，这部历法正式启用。历法中，第一次，中国人的一天也被划分为二十四格。十二时辰，一分为二。一时辰分成了二个“小时辰”，一天就分成了二十四四个“小时辰”。“小时辰”后来就简称“小时”。二十四小时，是西方天文学的计时制度，我们用上了和基督教国家相配合的历法。

中国人现在周末也休息，更是明显地受了基督教的影响。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最早在1601年出版的《天主实义》中介绍“星期日制度”：“列国之人，每七日一罢市，禁止百工，不拘男女尊卑，皆聚于圣殿，谒礼拜祭，以听谈道解经者终日。”《圣经》的“创世记”，记载上帝在七天里创生了万物，第七天休息。所以星期天教徒必须上教堂，礼拜上帝，这是铁的规矩。上海方言里，至今还把星期天叫作“礼拜天”。直到20世纪末，世界上还有许多基督徒商人在星期天大上门板，上教堂去。中国人不上教堂，但星期天的周末休息也已经是铁的规定。

“小时”“星期”“元旦”“世纪”“千禧年”，这些词汇已经刻在手表，载入日历，植入电脑，深入人心。如今谁再要像清朝不明事理的大臣杨光先那样赌气地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把西方的历法制度都赶走，他无疑是有精神病。假设今天谁持有一张“民族主义航空公司”签发的“孔子生二五五一年正月甲午日午时登机”的飞机票，他敢坐？不知1900

年的义和团拳民，和 2000 年的民族主义者是否想过：在 20 世纪排拒全球化，是和杨光先排外言论性质一样、程度不同的愚昧行为呢？

1600 年，利玛窦从澳门辗转来到江南，徐光启在南京见到了他。自从徐光启和利玛窦开始对话，以此为标志，中国人已经和西方文明打了四百年的交道。现在，第五百年的对话在 21 世纪又开始了。在过去的四百年里，尤其是最近 20 世纪的一百年里，中国人从西方人那里接受了许多名物制度。中国文化已经不再故我。古老的中国文化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的制度，如时间制度，深深地植入了中国文化，就像中国餐馆开到了美国、欧洲各大城市的每个角落一样，为各国人民享受着。其实，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自从各民族走到一起以后，这世界就联为一体了。“公元”，没有太重的民族意义了。况且世界上再也没有不变的民族，不变的文化。中国文明的特征固然还在。我们中国人还是各种人群中相对细腻、相当敏感的民族。我们特别能够意识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我们还是世界上最会吃的民族，我们还是用筷子吃饭，吃米饭。但我们毕竟已经在 20 世纪中融入了这个世界，我们正和许多其他民族一起分享着人类共有的东西。虽然我们常常觉得人类当中，这种共有的东西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但是，今天，我们至少有着一个普天同庆，天下一家的共同节日：2000 年的千禧年。不错了！

（原载《上海文化》，2000 年第 1 期）